

日本考古展

——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日本考古展

——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 /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518-0014-3

I .①日… II .①成… III .①文物—介绍—日本 IV .①K88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1591号

日本考古展

——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 政 编 码 710003

印 刷 空军西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80 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014-3

定 价 387.00元

网 址 WWW.sqcbss.com

《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

编委会主任：赵 荣

编委会副主任：郭宪曾 刘云辉 冯庚武 成建正

编委会委员：赵 荣 郭宪曾 刘云辉 冯庚武

成建正 罗文利 周魁英 张 彤

马振智

主 编：成建正

副主编：马振智 韩 钊 董 理

撰 稿：菅谷文则 韩 钊 今尾文昭 卜部行弘

大西貴夫 土橋理子 鶴見泰寿 橋本裕行

坂 靖 東影悠 廣岡孝信

照片提供：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 櫻井市教育委员会 梅原章一氏

日文翻译：苏 哲 橋本裕行 入倉德裕

贺 辞



为纪念陕西省与奈良县友好省县关系的缔结，我们合作举办了《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展览，并编辑出版《日本考古展》图录，这是陕西与奈良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也是对双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的最好纪念。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绵延 2 000 多年，堪称世界民族交往史上的奇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发生在陕西和奈良县之间。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六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隋、唐两代日本国共有包括空海、阿倍仲麻吕等 5 000 多位遣隋使、遣唐使到西安访问学习，其时正值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也就是日本国家的重要形成阶段，中国的城市建设、制度、思想、文化、艺术、宗教和风俗等，对日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对日本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曾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相互学习，促进了各自的发展进步，也留下了西安青龙寺、大兴善寺等双方交流互动的遗迹和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3 年 7 月，陕西省与日本国京都府签署了友好省府关系协议，1994 年 4 月与香川县缔结了友好关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今年又与奈良县缔结为友好省县，把陕西与日本的友好往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作为日本文物首次来华进行系统展览的《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展，是陕西和奈良文化交流合作的又一次创新，必将对今后两地进一步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代表陕西省人民政府和 3 700 多万陕西人民，对展览的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基础上，丰富交流内涵，扩大合作领域，不断续写中日友好的新篇章。

2011 年 10 月

陕西省省长

赵正永

賀 辞



陝西省と奈良県の友好関係の締結を記念として、今回『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華』という展覧を協力して開催すると同時に、『日本考古展』図録を編集して出版します。今回は陝西省と奈良県の文化交流の盛大なイベントだけではなく、お互いの友好関係が絶え間なく深化させるための一番いい記念にもなりました。

中日両国は一衣帶水の友好隣国で、その上、歴史的に2000年ぐらいの友好往来を持ってありました。このことは世界民族交流の歴史における奇跡と呼ぶことができました。長い歴史の中で、いろいろの物語が陝西と奈良の間に発生しました。中国唐代の鑑真大師が六たび日本に行つて、中国文化を伝えました。隋、唐期間、空海、阿倍仲麻呂などを含め5000人ぐらいの遣隋使、遣唐使が西安に訪問しました。その時ちょうど日本の飛鳥時代、奈良時代、また、国家の重要な形成段階に当たって、中国の都市建設、制度、思想、文化、芸術、宗教及び風俗などは日本の中央集権国家の確立と日本の歴史文化の形成と発展に対して長くて深遠な影響を及ぼしました。長い歴史の中で、両国人民の友好往来、お互いの勉強することが各自の発展を促進して、西安の青龍寺、大興善寺など双方交流の遺跡と証拠も残ってあります。中日国交正常化以来、双方の関係にも新しい時期に入りました。1983年7月、陝西省と日本京都府が友好都市関係を締結して、1994年4月香川県との友好関係を締結しました。まもなく中日国交正常化40周年になる時、今年、陝西省と奈良県も友好関係を締結することは陝西省と日本の友好往来が新しいレベル向上させました。

『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華』という展覧は日本の文物が始めに系統的に中国での展覧として、陝西省と奈良県の文化交流提携のまた新しいものを作り出しました。今回の展覧会が必ずお互いの了解と友好関係をいつそう深めるのために積極的な影響をもたらします。私は陝西省人民政府と3700万の陝西人民を代表して、展覧会の開催することを心からお祈りします。双方は今回の展覧会をきっかけとして、相互尊重、平等、相互信頼に基づいて、これから、交流内容を豊かにして、提携分野が拡大させて、中日友好の新しい一章を書き記すこと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

2011年10月

陕西省省長

趙正永

贺 辞



值此旨在纪念日本奈良县与中国陕西省结成友好合作关系的《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之际，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日本与中国乃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彼此有着两千多年的交流历史。尤其是，奈良县和陕西省作为两国古都所在地，即隋唐国都长安和日本国都平城京，曾经往来频繁。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悠久渊源的奈良县出土文物此次在西安展出，我认为其意义非常深远，同时也是一次加深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及日中交流历史了解的难得机会。在中国国内展示日本出土文物，据悉今尚属首次。能够以这一形式拓展两国文化交流，令人可喜可贺。

明年 2012 年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我希望，要让这值得纪念的一年成为更多日中两国国民近距离感受日中关系、巩固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基础之年。我期待，此次奈良县和陕西省友好合作关系的缔结，此次展览的举办，能够成为加深日中两国国民相互理解、进一步扩大日中两国各地丰富多彩交流的契机。

在此，我向为举办《日本考古展》而尽心尽力的奈良县及陕西省等相关方表示敬意，并衷心预祝此次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2011 年 10 月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丹羽宇一郎

賀 辞



このたび、日本奈良県と中国陝西省の友好提携締結を記念して、陝西歴史博物館において「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出土考古文物精華展」が開催されますことを心からお慶び申し上げます。

日本と中国は一衣帶水の隣国であり、二千年前にまで遡る交流の歴史を有しています。なかでも、奈良県と陝西省は両国の古都であり、隋唐の都長安と日本の都平城京の間で盛んな往来がありました。そのような中国と歴史的に深い関係にある奈良県出土の文物が、ここ西安で展示されることは大変意義深く、中国の方々に日本の歴史や文化、また、日中間の交流の歴史への理解を深めていただくまたとない機会になるものと思います。日本で発掘された文物が中国国内で本格的に展示されるのは、今回が初めてとのことです。このような形で両国の文化交流の輪が広がってゆくのは誠に喜ばしいことです。

来年2012年は日中國交正常化40周年に当たります。この記念すべき年を、できるだけ多くの日中両国民に日中関係を身近に感じていただき、未来志向の日中関係の基盤を固める機会に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このたびの奈良県と陝西省の友好提携締結及びこの展覧会開催が、日中両国民の相互理解を深め、日中両国の各地において様々な交流が更に拡大する契機にな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

「日本考古展」の開催にご尽力された奈良県及び陝西省をはじめとする関係の方々に敬意を表するとともに、この展覧会が成功をおさめますよう心から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平成2011年10月

在中華人民共和国日本国特命全権大使

丹羽宇一郎

致 辞



日本故都奈良和中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奈良作为首都的7、8世纪，日本通过积极地吸收隋唐文化，实现了古代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即便是今天，那个时代的知识和文物仍然以寺院建筑、佛像、平城京遗址等形态保存了下来。

因为这种文化纽带的存在，去年在奈良县举行的平城京迁都1300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国陕西省人民政府派遣了代表团，同时在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举办了《大唐皇帝陵展》，通过多方面有益的事业合作，使得盛大纪念庆典完满闭幕。对此，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双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友好关系，促成了奈良县和中国陕西省友好协议的缔结。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奈良县、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了《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

这次展览会将日本奈良发掘出土的文物运到海洋彼岸的中国展示，对日本来说是第一次尝试和挑战，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次《日本考古展》通过展示日本古都奈良的出土文物，追溯从旧石器时代到平安时代日本的发展历程，以及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的足迹。

期待着通过本次展览会，中国各界会进一步理解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同时祈念两国间民众的交流不断深化，使日中友好迈出新的一步。最后，借此机会向为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作出贡献的日中两国各界人士致以由衷的谢意。

2011年10月

奈良県知事
荒井 正吾

ごあいさつ

日本の古都である奈良と中国は、長きにわたり友好の歴史を育んできました。特に奈良に都がおかれた7?8世紀には、日本は隋?唐の文化を積極的に取り入れることによって、古代国家として成長をとげました。今もなおその時代の知識や文物は、寺院建築や仏像、あるいは平城京跡を始めとする遺跡として数多く伝えられています。

このような繋がりの中、昨年奈良県で開催された平城遷都1300年祭では、中国陝西省人民政府からは代表団を派遣されるとともに、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において開催した「大唐皇帝陵展」を始め多くの事業に協力をいただき、盛大に終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厚くお礼申し上げます。これを機に更なる友好関係を築くべく、奈良県と中国陝西省が友好協定締結の運びとなり、記念に奈良県?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と陝西省文物局?陝西歴史博物館の共催で「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出土考古文物精華展—」を開催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この展覧会は日本奈良で発掘された文物が海を渡り中国で展示されるという日本では初めての試みであり、日本国内でも多方面から耳目を集めております。このたびの「日本考古展」では日本の古都奈良の出土文物をとおして、旧石器時代から平安時代に至る古代日本の歴史を辿るとともに日中両国の交流の足跡を紹介いたします。

本展覧会をとおして中国の方々に日本の歴史や文化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くとともに、両国の国民がより一層交流を深め、日中友好進展の新たな一步となることを祈念いたします。最後になりましたが、この展覧会開催にあたりご尽力いただきました日中両国の関係各位に厚くお礼申し上げます。

2011年10月

奈良県知事
荒井 正吾

C 目录 CONTENTS

- 001 致辞 贺词
- 001 日本古代文明的摇篮——奈良县 菅谷 文则
- 007 唐风洋溢奈良城 韩釗
- 013 奈良县位置示意图
- 014 奈良主要遗址分布图
- 015 奈良旧石器、绳文、弥生时代主要遗址分布图
- 016 奈良古坟时代主要遗址分布图
- 017 奈良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主要遗址分布图
- 018 奈良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主要遗址分布图

第一部 古代奈良的历史

旧石器时代

- 020 综述
- 021 图版
- 024 展品解说

绳文时代

- 025 综述
- 027 图版
- 040 名词解释
- 040 遗址解说
- 041 展品解说

CONTENTS

目录

- 弥生时代
 - 047 综述
 - 049 图版
 - 062 名词解释
 - 063 遗址解说
 - 064 展品解说
- 古坟时代
 - 069 综述
 - 070 图版
 - 114 名词解释
 - 114 遗址解说
 - 118 展品解说
- 飞鸟、奈良、平安时代
 - 136 综述
 - 138 图版
 - 160 名词解释
 - 160 遗址解说
 - 166 展品解说

第二部 古代奈良与中国文化

- 178 综述
- 184 图版
- 213 名词解释
- 213 遗址解说
- 216 展品解说
- 229 古代中日交流简略图表

日本古代文明的搖籃—奈良县

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 所長 菅谷 文則

日本列島靠近亞洲大陸，猶如一張彎弓從北向南縱長延伸。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4個主要島嶼和保留著濃厚的獨特文化色彩的島嶼群構成。北端的北海道稚內市弁天島（北緯 $45^{\circ}31'$ ），到南端的東京都小笠原村沖之島（北緯 $20^{\circ}25'$ ），南北距離達3294km。縱貫亞寒帶到亞熱帶的氣候帶。

舊石器時代的末期（距今3萬數千年前）人類開始在日本列島留下生活的痕迹。雖然可以推測列島存在年代更古老的石器，不過目前尚未發現年代確凿的遺迹。根據古動物學和植物學的研究成果，日本列島雖然存在特有物种，然而動物相和植物相與大陸，特別是朝鮮半島相似。依據地學理論，日本列島與亞洲大陸是在地史上的新生代第四紀分離的。

從人類在日本列島上開始生活的舊石器時代後期至整個新石器時代，屹立在奈良盆地西部的二上山（海拔471.10m）山麓地帶盛產贊岐岩，得益於這種石料資源，利用其邊緣銳利的剝片製造石器的生產活動在奈良盆地開始了。

日本列島，特別是本州島的西半部，發現了大量的來自二上山麓的石器原料。如圖所示“瀨戶內技法”確立了使用贊岐岩製造石葉（刃器）的技術。石矛與其變種“有舌尖頭器”為後繼類型，延續至繩文時代。石矛使用的後期已經出現被命名為隆起線紋陶器的繩文草創期的陶器。根據物理學方法分析的結果和考古學發掘調查的陶器編年研究，距今13000年以前已經開始了陶器製作。這個年代數據是 ^{14}C 年代測定的結果，其他的物理學年代分析法也表明，日本最初的陶器出現在距今13000年前。這是目前所知世界最早期的陶器燒制。那時，末次冰期開始向溫暖期轉變，即便是在冬季的結冰期也已經不可能徒步遷徙於日本列島與亞洲大陸之間。日本繩文時代的陶器，與其說是受外來影響產生的，不如說是列島內部生成的，後者的證據更加確凿。

在繩文時代約1萬年以上的漫長時期的後半段，亞洲大陸，特別是中國大陸進入了國家形成的時期，出現了高度文明的社會。繩文時代的日本與中國大陸文化交往的痕迹几乎無法確認，不過在日本列島東北地方的山形縣，曾出土具有三足的繩文陶器。三足器是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形態上標

志性的技术特征之一，此后二里头期以降的青铜器（鼎、爵、盉、斝等）也采用了三足的造型。在绳文式陶器中，三足器发现的数量极少，然而，三足器型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与中国大陆的文化接触。在绳文陶器出土地点附近的另外地点，还出土过刀币，也可以作为证明某种交流存在的资料。因为属于偶然出土，很难以此为根据推进关于该时期日中文化交流的讨论。

绳文时代后期、晚期的遗址出土过稻米。关于水稻传入日本列岛，特别是九州岛的路线，虽然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不过目前为止尚无定论。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漫长的绳文时代结束，历史向弥生时代转换。

陶器趋于齐一化，定居生活和水稻耕作的开始，金属制品以及玻璃器的使用和生产等被认为是弥生文化的典型特色。作为时代名称的弥生陶器的使用和其他的三大要素并非同时开始的。既往的记述常常忽略弥生陶器与其他三要素起始的时间差。各自要素的开始时期存在差异是理所当然的，铁器出现在弥生时代的前期末叶，青铜器也出现于弥生时代的前期末叶左右，玻璃制品从弥生时代中期开始出现，上述看法今天已经成为共识。水稻的耕种与弥生陶器的使用大致同时发生。弥生前期初叶，弥生陶器的使用和水稻耕种成为一种组合，从北部九州向列岛各地扩散。

关于构成弥生时代的四个要素之中的水稻耕种传入日本的路线，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即从中国大陆的江南地方沿太平洋岸北上，经由朝鲜半岛东南部抵达日本列岛的观点；以及不经由朝鲜半岛，从中国江南直接传入日本的观点，分歧显而易见。此外还存在从中国东北地方经由朝鲜半岛北部，南下到半岛南部的传统看法。由于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国东北的广袤地域中没有发现留下水稻耕种痕迹的遗址，所以我倾向于赞成第一种观点，即江南→朝鲜半岛东南部→日本列岛的传播路线。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中，短剑和矛的形态与从中国东北部到朝鲜半岛分布的铜剑、铜矛类似，因而青铜器确实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关于铁器，锻造和铸造铁器均有发现，锻造的出土例较多，应该是源自西汉的技术，一般认为是经由朝鲜半岛传来的。玻璃器中有较多的琉璃璧，其碎片好像被作为玻璃的原料，所以必须考虑与长江流域的交流。

在弥生时代的某一时期，《汉书·地理志》并未明确记载是哪一时期，日本列岛的居民，即倭人与汉土进行了交流。这种交流与其说是偶发的，譬如漂流，不期而至，不如理解为不定期的、有目的的交流。地志记“以岁时来献见云”，不过在外蛮传中并未给倭人立传，且未明示年月。暗示上述的结论是正确的。

其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国派使节来访，“光武赐以印绶”。《后汉书·倭传》记载了此事。天明四年（1784），光武帝所赐金印从北部九州的福冈市东区志贺岛出土。《后汉书·倭传》保留着此后交流的记录。在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愿请见”。关于这个倭国王帅升的名字的读法，有训读为“大和”（奈良县）的，也有释读为“伊都”（九州北部）的，未有定论。这两次朝贡都包括在被考古学命名为弥生时代的这一时期中。可见日中邦交始于弥生时代的后半期。

现在一般认为古坟时代始于3世纪中叶，也有研究者认为始于3世纪前半叶，这与20世纪认

为古坟时代始于 4 世纪的观点大相径庭。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用 1233 字详细地记载了倭和曹魏的邦交关系，以及倭土的风俗习惯、路径里程等。景初三年（239），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遣使访问了曹魏，正始元年（240）带方“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倭国所上表文，倭使以及所奉献生口的口述，回访倭国的带方郡吏的见闻等成为《魏略》的史料来源，西晋陈寿（233—297）编纂《三国志》时采用了这些记述。魏志“倭人条”记：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使诣魏庭。魏帝诏封其为“亲魏倭王”。正始八年（247）或略晚些时候，卑弥呼死去，“以死作大冢径百余步”，建造了大型坟墓。

卑弥呼墓在古坟时代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倭国社会构造、政治构造的复原，进而关于日中交流史的评价都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总之，以卑弥呼为王的社会，在什么程度上实际统治着日本列岛的哪些地域？邪马台国的位置，是在九州岛呢，还是在本州岛中央部的奈良县呢？对这些基本问题认识的差异导致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在奈良县的话，应该在缠向遗址周围的古坟中寻找卑弥呼墓。我个人赞同邪马台国即大和（奈良）的观点。认为古坟时代开始于 4 世纪是 20 世纪的基本思考。以女性作为国王的邪马台国，与基于《日本书纪》等的史书记载的建国神话不相符合，或者可以说是不想依从那种历史观。日本古坟出土的青铜镜中，共计 8 面铸出青龙、景初、正始的年号，是与曹魏交流的证据。围绕纪年镜的制作地，存在魏镜说、倭镜说，我赞同后者。关于中国境内三角缘神兽镜有无的问题，许多中国考古学者也在反复搜寻，最终皆未发现，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还有，铸有东吴“赤乌”年号的铜镜也出土了 2 面。东汉和曹魏前后持续的册封关系，因南北分裂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而，中国大陆南北对立的政治状况，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国家的分立）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曹魏再度设置的带方郡等的消失，也成为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形成的远因。在日本列岛，接受曹魏的册封的倭国也发生了分裂，回到小国分立的状况。

西晋泰始二年（266）时，倭国遣使西晋。派遣使节的应该是卑弥呼的宗女壹与。

继而存有史料记录的是东晋义熙九年（413）倭国贡献方物。其距正始八年大约有近 150 年的空白时间。向东晋、宋、萧齐派遣使节的 5 位倭王（也有 6 位的说法），日本史上称之为“倭五王”，在初中的教科书中对此也有记述。东晋、南朝 5 个朝代中的 3 个和倭有着朝贡和册封关系。东晋、南朝的首都是现在的南京市。东汉和曹魏的首都是黄河流域的洛阳。这种变化，是伴随晋室南迁、东晋的南方建国发生的。也许利用了以前与吴交往时已经熟知的航路。倭与南方政权有着 13 次见于记录的交往。关于遣使的王，后世将其比定为应神天皇至雄略天皇，现在未有定论（汉风谥号是 8 世纪撰议的）。但是发掘调查的出土文物中几乎没有发现反映与南朝频繁交流的遗物。关于该时期与北朝的交往，史籍中缺乏记载。然而，反映倭与北朝交流的文物或北朝系的文物则不乏出土例证。产于西亚的玻璃容器等，据说是经由北朝传入的。因而，出土文物与文献所记交往的实态差距甚大。关于这一现象该如何解释，迄今几乎没有被认真讨论过。

南朝文献所记录的交往期间（413—502）内，倭与朝鲜半岛之间也存在着频繁交往的记录。

吉林省集安市“好太王碑”的碑铭就是无可置疑的史料之一。5世纪，朝鲜半岛的三国与南朝或者北朝的交往也呈上升趋势。日本列岛处于古坟时代中期，硬质陶器——须惠器开始生产，古坟出土的铁制品的量也大幅度增加。玻璃珠的生产量与颜色、种类也不断增多，技术进步显著。鎏金、银技术实现了普及。此外，纯金的耳饰和腕饰等，即便当时日本列岛不出产的贵重金属的进口也达到相当数量。而且，黄金经常被用来装饰武器和武具，制造耳饰等随身装饰品。6世纪时，鎏金管制的耳饰成为相当普及的首饰。

关于置放在巨大的古坟封土表面的陶制圆筒形埴轮、器材埴轮、人物埴轮的起源，有研究者推测其与中国的墓室内配置的俑，神道设置的石人、石兽有关。近年，日本考古学的研究考察清楚了埴轮的演化轨迹。从早期的圆筒形埴轮，稍迟演化出器台埴轮，继而产生器材埴轮（房屋形、武器形等），至于人物埴轮的登场还要经过若干的时间。器材埴轮和继之出现的人物埴轮是倭五王时代的产物。倭五王派出的使者们抵达南朝首都（现在的南京市区）时，如果不是利用长江从北面入城，而是利用陆路从东面入城的话，就可以眺望分布在建康东郊的东晋以来的皇陵，甚至有机会观看上陵祭祀等活动。倭与南朝的这种交往和日本古坟埴轮起源的关联性也还留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未见于史籍记载的交往之一是与五胡十六国时代北燕的关系。辽宁省北票市冯素弗墓出土的金属冠饰和奈良县橿原市新泽千冢126号坟出土的同类遗物的大小、意匠均极为相似，两者又都随葬西亚产的玻璃容器。两座古墓随葬品存在着高度的类似性。如果简单地阐明结论的话，我的看法是倭从北向南，沿着朝鲜半岛的西海岸、渤海湾沿岸、山东半岛沿岸以及从黄海到长江下游的漫长的海岸线，在纵贯南北的广大地域与大陆进行了交往。三国的曹魏和孙吴的纪年镜在日本列岛的出土，会成为支持这种看法的基本资料之一。南朝末期，倭没有向陈派遣使节，而隋建国之后，立即派出了遣隋使，说明倭正确地掌握着有关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信息。

538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在日本历史上，一直影响到现代生活的宗教落地生根。公元600年以降，又开始引进儒思想，作为国家统治的规范。继而，导入唐令、唐律，具体制定了国家统治的秩序。至此，直到21世纪的日本佛教思想，各领域的国家观等的“根”的部分已经被固定了。通过遣隋使，继之遣唐使的多次派遣，带回的思想、文物制度经过咀嚼、消化，实现了日本化，成为思想、制度、文化的根干部分。最为重要的是日本并非单纯地模仿隋唐文化，而是作为7—8世纪的世界文明的基准，积极地导入隋唐朝文化，弥补自身的不足，促进其与日本列岛的本土文化的融合。

同时，还连续多次派遣了遣新罗使、遣渤海使，并接待了新罗使节和渤海使节。10世纪以后的交往由国家间官船的往来演变为依赖于贸易商人、物流商人们的活动。当时许多佛教僧侣搭乘商人的船只入唐朝或者入宋巡礼。842年入唐的僧人坚惠，回国后创建奈良县佛隆寺，致力于天台教学。东大寺僧裔然、天台僧成寻等也曾搭乘商船入宋。政治和佛教以外，他们将许多风俗也传播到

日本。现在日本文化中茶道、花道的渊源可追溯到这些僧人的活动。佛教僧侣们还带回了建筑、绘画、书法、园林等技艺，在日本传授，最终实现了日本化。而且，商船（或商业）的往来，将扇子、倭刀（日本刀）等奈良的物产输往包括陕西省在内的中国（输往南宋）。

时代略早，将严格的戒律带给奈良佛教的鉴真法师曾在长安实际寺修行，寺院旧址在今西北大学的一隅。702年，从日本入唐的僧道慈（？—744）在长安西明寺修行佛教，回国以后，正值营造大安寺。道慈以西明寺为基本模型推进了大安寺的营建。在东大寺建成以前，大安寺在平城京内是规模最大的寺院，早在飞鸟、藤原京时代其就已经是国家的大寺院。

在佛教方面的交流还可列举出平城天皇（806—808在位）的废太子真如。他在被废黜后皈依佛门，唐咸通五年（864）5月21日，抵达长安。据说懿宗皇帝为真如的诚挚与热情所感动。真如入唐的漫长旅程是从奈良县御所市的巨势寺开始的。

无论任何时代，悠远的历史像一条纽带将奈良和西安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这里凝缩了从古代到中世纪日中交流的足迹。